

編者按

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受到近鄰蘇俄和日本的巨大影響。「百年中國與世界」欄中，沈宗武指出在蘇聯國家結構中，聯邦制服從於共產黨的中央集權制是維繫穩定存在的命脈，一旦失去了管理黨和國家的權力，就注定了蘇聯解體的結局。史達林當政時期，作家蕭洛霍夫因與權勢媾合，對「持不同政見」者作出批判，導致後世對其人評價不一。「隨筆觀察」欄中，向繼東認為至少在30年代，蕭洛霍夫作為一個有社會良知的角色，其不與集權妥協的態度還是應該肯定的。長期以來，法國作家奔達被視為斯大林主義份子。孫傳釗則指出，奔達在其小說《知識份子的背叛》的再版前言中，從唯理主義的角度完全否定辨證唯物主義，明確地批評知識份子為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背叛自己的職責；至於其在晚年傾向左翼，則和他是猶太人、有一種需要自我防衛的潛意識有關。另一方面，臧一冰總結了福澤諭吉的思想歷程，指出以外人為師時，應如福澤諭吉那樣全面、系統地瞭解別人的情況，然後嘗試增長社會公眾的整體見識；但卻不宜懷著一種復仇的心態去學習，從世界範圍來看用煽動民族主義的賭氣的方法來尋求發展的動力。

「人文天地」欄中，李亞萍分析了美國華人英語作家和華裔作家熱衷書寫中國故事的文化現象，提出他們之所以被認為善寫「人類學」或「政治學」主題，與他們迎合主流讀者的閱讀興趣有關。為了個人和藝術的生存發展，他們在作品中不得不強調民族文化特色，以凸現與美國主流文化的差異。

「社會、經濟與傳媒」及「政治與法律」二欄，從各方面探討了中國農村的問題。連連指出「浙江村」的地緣與業緣並存，很可能作為新的社會空間長久存在；但其地域上的非穩定性以及內在組織程度的欠缺，使它難以

發育出類似村組織一級的「准地方政府」的結構和職能。黃波認為在中國，非政府組織和基層政權之間既存在著合作與互補的關係，又有來自二者各自的組織原則和文化關懷的不同而導致的衝突因素。發揮二者功能性的合作，融合二者之間的衝突不僅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於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將產生很大的影響。郎友興總結中國村民選舉與自治的經驗與理論意義，認為目前在中國農村所實行的村民選舉是一個由政治精英/政府主導的民主化過程；但是人們對於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期望很高，而沒有認識到民主制度本身能力的有限性。

此外，本期諸欄也從舊刊中選取了一些關於俄、日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中國農村問題的專文，俾讀者配合閱讀。